

评论员观察

既要美丽草原，也要幸福生活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牧业供给侧改革观察

刘天亮

初秋，还没到传统意义上的牲畜出栏期，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已经加工生产了160多万只羊，往年同期，这个数字几乎为零。这里的牛羊养殖，正在从传统的“连大带小一次性”出栏，向“多季出栏、均衡上市”转变。

走出“季节性集中出栏”的生产经营状态，是对“生态保护”和“农牧民增收”这一矛盾的破解。锡林郭勒大草原是我国四大优质草原之一，但每年出栏的牛羊肉仅占全国的1.78%。因为“一羊独大”导致草场承载力降低，集中出栏又削弱了农牧民的市场议价能力。养得越多，越走不出“增产不增收”的怪圈。如何既有美丽草原，又有幸福生活，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命题。

大草原上世世代代的牧羊人，要收获现代养殖业的红利，不能迷信“养了几辈子羊”得来的经验理念、形成的路径依赖，而要主动迎接生态约束、市场规律的检验。有时候，调整一下养殖结构，就能让一样的草场实现不一样的效益。据测算，2015年，养殖一头基础母牛的平均利润，大约相当

于养11只羊，而平均消耗的草料仅相当于3只羊。正因为此，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稳羊增牛扩猪禽”的多样化发展战略。这样的转型思路，当地总结为“争先恐后”。争先，就是发展先进产业，以优质良种肉牛产业为突破口；恐后，则是转型升级，包括养羊在内的低效畜牧业。

同步做好生态建设和农牧民增收两篇大文章，对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连成一体，才能走向良性循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保护好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态环境，是各族干部群众的重大责任；要加快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步伐，探索一些好办法，帮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利润效益。从现实经验看，一个好的生态治理思路，还要可以给农牧民带来经济

效益，才有可能成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响应锡林郭勒盟“减羊增牛”战略，正是因为它找准了生态恢复、农民增收的结合点，让许多养殖户看到“把羊换成牛，既能保持草木生长旺盛，又能节省劳动力，还能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追求的生态文明，不只是简单重现水草丰美的盛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谐，还要构建捍卫农牧区现代生活的内在社会体系

效益，才有可能成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响应锡林郭勒盟“减羊增牛”战略，正是因为它找准了生态恢复、农民增收的结合点，让许多养殖户看到“把羊换成牛，既能保持草木生长旺盛，又能节省劳动力，还能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追求的生态文明，不只是简单重现水草丰美的盛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谐，还要构建捍卫农牧区现代生活的内在社会体系，比如基于现代技术的新型生产经营方式，基于市场供需的现代生产销售体系，等等。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才能走向现实。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的牧民呼尔图嘎，8年前还面临着家中1800亩草场80%严重退化的窘境，如今却摇身一变从养牛牧羊人转为草原生态鸡养殖户，注册了

多个商标品牌，2016年通过微信订单向北京供货8000只“草原飞鸡”、29万颗柴鸡蛋，收入近100万元。这既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对市场的开拓，更要归功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在当地做的生态恢复试验，他们限制中型和大型牲畜数量，发展对草原破坏很小的禽类，为生态异常脆弱地区的绿色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发展生态文明，则需要用行动搭一座通往新天地的桥。产业升级事关无数人的生计，不是轻轻松松一阵冲锋就能完成的。事实上，尽管确定了新的战略，开始了新的转型，在2016畜牧业年度，锡林郭勒盟的羊存栏数仍占到牲畜总头数的89%，好在当地正在下力气优化龙头企业与牧民、合作社的共赢机制，让开始转变饲养方式和经营观念的新型农牧民有了更多底气。相信随着这座通往生态文明的桥梁越来越结实、越拓越宽广，一个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美好未来，就能紧紧握在我们手中。

人民时评

综合运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力量，就能为提升质量提供良性土壤，形成建设质量强国的合力

“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日前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和问题突出，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迫切要求下最大气力全面提升质量，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能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关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核心竞争力；而拥有多少高品质的知名品牌，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高铁，“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之所以能够成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与品质有关；外国网友感叹“中国手机好用到难以置信”，在国外甚至被“山寨”，也与品质有关。在中国经济规模扩张的表层之下，还潜藏着一个质量提升的转型故事，这几天到国家参加“1+6”圆桌对话会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纷纷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转型进程举世瞩目，堪称‘全球典范’”。

在为国货行销海外而振奋的同时，也不必回避，人们出国抢购电饭煲带来的集体尴尬；不必讳言，我们曾长期连圆珠笔芯都要进口，以至于有人感叹“中国能造原子弹，为何造不好圆珠笔芯”？更不能无视，世界上各类名牌商品，其中发达国家拥有大多数品牌所有权，长期处在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而我们长期徘徊在低端环节。如何扭转这一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早已给出答案：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提质增效，建设质量强国。

无论是培育壮大民族企业和知名品牌，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还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无不需要在提升质量上谋篇布局、爬坡过坎。特别是今天，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层次提升，但供给质量跟不上。正因此，提升质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质量强国已是时代热词，也是全民共识。但相比于扩张规模和加快速度，实现提质增效的化学反应要难得多；而要突破已经形成的世界品牌格局，对后发国家更是未曾有过的挑战。正因此，《意见》不仅提出目标、规划蓝图，更从政府、企业 and 市场等不同维度，提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企业和市场这一侧，要求抓住“品牌”这个牛鼻子，培育壮大民族企业和知名品牌，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用精益求精的精神雕琢品牌价值。在政府这一侧，既“强监管”，要求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又“强引导”，建立高水平的标准体系，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综合运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力量，就能为提升质量提供良性土壤，形成建设质量强国的合力。

有人说：“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将成为和平占有市场最有效的武器，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在这场质量竞赛中，我们并未缺席。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开创富有生机的质量时代，将不仅提升经济增长的品质，更将为中国赢得未来。

开创新机勃勃的质量时代

王石川

新论

大国创新需“握指成拳”

贾宝余

日前，“哈佛八剑客集体回国”的消息在微信上刷了屏。加盟位于合肥科学岛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的8名留美博士后，不仅已做出不少成果，而且摸索出减少磨合成本的工作流程。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科研条件加速改进，越来越多的人才被祖国科技创新的“磁场”所吸引。

与吸引人才同时推进的，是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基地的深度调整。日前，三部委联合印发《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提出将围绕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布局需求，按照科学与工程技术、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三类布局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方案特别强调，坚持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统筹布局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解决现有基地之间交叉重复、定位不够清晰等问题。

回顾科学史，近代以来的国家科研机构，往往以“学科”作为建制基础。而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防实力、国土安全、生态环境、公众健康等，往往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学科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每个单一学科受制于理论视角和方法手段等局限，都不足以单独支撑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汇集多学科智慧，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这不仅需要以“学科”作为科研团队的微观知识基础，更需要以“任务”作为科研团队的宏观需求导向，汇集多学科优势，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开展协同创新，捏沙成团、握指成拳，集中优势力量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组建国家实验室，就是剑指科研布局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形成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

量，“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保障国家创新发展和战略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对美国科技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并非“一建定终身”，而是动态调整，突出体现在资助机构根据阶段性战略需求对国家实验室进行优化调整、资助机构对运营机构进行择优选择和委托代理等方面。其国家实验室大多数由大学等运营机构担任管理者。近年来，美国一些实验室的安全漏洞和管理丑闻，“使人们开始质疑大学是否是国家实验室的最好管理者”。因而，更多的科研机构、非营利机构和企业先后成为国家实验室的运营主体。

开放性是国家实验室竞争力的源泉。国家实验室作为一种任务导向的平台型科研机构，其秉持的基本理念应该是：开展科学研究的最佳方法是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个人组成团队一起工作。在技术加速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合同制雇员、客座研究员、博士后等制度，吸引新的力量持续流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告诉我们，既要世界眼光和开阔胸怀吸纳世界先进经验和做法，也要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创新意识，发挥好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的重大作用，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筑巢引凤，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将迎来更多高水平团队，将汇聚成科技创新的磅礴力量，支撑引领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沉迷手游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手机游戏种类的增多，未成年人玩手机游戏越来越普遍。然而，近期频繁出现的“熊孩子”沉迷手游，甚至偷刷家长银行卡充值的现象，令不少父母心忧。事实上，长时间玩手机游戏，不仅会耽误学业，也危害孩子的身体健康。

这正是：稚子乐佚游，年华似水流。玩物徒丧志，老大叹未休。

贾强图 杨立新文

连线评论员

科技创新要有自己的地基

浙江日报评论员 王玉宝

对一个地方而言，基础科研能力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坚实地基。一段时间以来，从安徽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到浙江成立之江实验室在杭州揭牌，瞄准了“国家实验室”。再往前，致力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迎来了首届19位博士生入学，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清华、中科大、北大三位教授各获百万美元奖金，“大手笔”引发大关注；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打造的之江实验室在杭州揭牌，瞄准了“国家实验室”。再往前，致力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迎来了首届19位博士生入学，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政府到民间，不断对基础研究追加投入，科技创新的观念无疑在变。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浅表性创新，而是不断将创新引向重大基础性研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作长期投入，期待实现真正能影响世界的原创性突破。

历史表明，竞争到最后，是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创造了不少奇迹。但是当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期，当努力向产业链高端挺进、积极抢占国

际竞争制高点之时，浙江强烈地感受到基础科研能力的短板。仅从国内比较看，浙江的一流高校不多，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等方面还是空白，不仅与长三角兄弟省市差距不小，也与浙江的经济地位和转型升级需求不符。浙江要实现创新强省，就必须打造高能级的科技引擎。

一个高等级的科研实验室，能够成为重大科研成果的发源地，更能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中控室”。比如，最近安徽通过申报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就瞄准了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而之江实验室聚焦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谋划建设量子云、工业物联网、大脑观测及脑机整合、量子计算研究四大科学装置，直指“汇聚全球科研人才的开放型创新基地，跨学科集成的平台型创新基地，集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于一体的枢纽型创新基地”。

当今中国，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企业应用端的创新层出不穷。这固然可喜也不可或缺，但仅限于此，恐怕还是难以满足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难以形成面向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作重点说明，在去年的全国“科技三会”上，又再次强调“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而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力量”自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把科技创新目标瞄准战略性、前瞻性基础领域，意味着新的创新矩阵正在形成，我国科技创新正在进入纵深领域。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施一公说：能获大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过去十多年对基础研究的连续投入，不然是一万没有可能的。无论是科技体制改革、“双一流”建设等顶层设计，抑或是蛟龙探海、嫦娥奔月等“大国重器”的重点突破，都可以看到，我国正在朝着科技创新的方向实施战略突破。当国家、地方、高校、企业都一同为此砥砺奋进，我国必能“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奠定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

让新能源汽车“大行其道”

石聆

近日，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我国已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而即将落地的双积分政策，旨在使汽车企业的新能源积分和油耗积分并驾齐驱，使利润水平与新能源车销量挂钩，可视为推动传统燃油车退出的先声。使用新能源汽车是行业的趋势，也是未来出行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很多国家已出台了类似的禁售日程。英国、法国今年宣布将于2040年开始禁售传统燃油车，同为发展中大国的邻国印度将2030年确定为禁售时间，挪威、荷兰更将这一节点提前至2025年。有人说，“禁止销售传统燃油车，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但相比2016年中国乘用车2500万辆的总产销量，同年新能源汽车销售50万辆的数字，仍只是九牛之一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预示着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大有可为，所以，中国对于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和举措，不是盲目跟风，而是深思而行；不是一时变通，而是长久之计。

与新能源汽车趋势相适应，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也日益清晰。财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为避免企业患上财政补贴“依赖症”，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的退坡政策已经明确。不可否认，补贴政策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概念的普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长期执行步伐，容易造成企业盲目扩张，形成产能过剩，甚至有个别企业钻空子“骗补”，以低成本制造低端新能源车并通过补贴获利，财政部去年就曝光了五家骗补企业并严肃追责。长远来看，降低补贴幅度，既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更能倒逼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加快转型升级，制造出真正让消费者受益的新能源汽车，最终获得与传统燃油车的比较优势。从政府补贴引导为主，转变为政府引导与市场竞争相协同，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显著特色。

说到底，执行消费补贴、确定禁售日程只是将新能源汽车业“扶上马”，能不能行稳致远，最后还是要靠新能源车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水平。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下不少人新能源汽车的前景仍持观望态度。以北京为例，尽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愈发抢手，但上牌率却并不高，徘徊、放弃者不在少数。这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存在短板，如最大续航里程不足、充电不方便等。就此而言，只有加快技术研发、实现关键突破，提供技术成熟同时又安全便捷的汽车产品，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取代燃油车，开创属于新能源汽车的透明时代。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阵痛，但新旧迭代是不可抵挡的趋势。在交通领域，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虽然伴有挑战，但只要聚精会神把质量搞上去，新能源汽车总有一天会“大行其道”。